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晚清中国沿海南、北洋概念再考

何国播

［摘要］ 清代中国海疆存在多种划分方式。经由道光朝漕粮海运，以长江口为界划分南、北洋在朝野上下形成共识。同治朝“南洋通商大臣”之名的出现与众多口岸陆续开放有关，原“五口通商大臣”过渡为“南洋（各口）通商大臣”。光绪元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海防语境下的南洋囊括了长江口以北的江苏沿海部分。以海军衙门为代表的清廷高层主导了新一轮南、北洋地理志书的书写与传播，大量北洋舆地图说涌现。由于南洋地广，官经数任，光绪朝中后期南洋大臣影响力与南洋这一概念所涉地域范围多限于两江辖境。

[关键词] 海运　中国沿海　南洋　北洋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5－0015－009

清代中国海疆以省界划分海疆洋界的同时，还存在内、外洋划分方式。晚清整个沿海二分为南、北洋逐渐占据主导，尤其是南、北洋大臣与南、北洋水师的设立无疑使得南、北洋之名广为人知，而“北洋”之名在清末民初尤为瞩目。[①] 由于南、北洋这组概念既有地理属性，后来又作为官称，成为政治概念，在不断流变过程中增加了其复杂性。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一文（以下简称“郭文”）从世界观角度综合分析了东、西、南、北洋的流变脉络。[②] 笔者认为从清代内部视角出发，南、北洋概念的流变仍有若干剩义可考。

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南、北洋这组概念宋元以来即见于文字记载。进入清代，“南洋”的其中一条含义是指代环南海的东南亚国家，自康熙至道光年间，此“南洋”脉络在清代文献中清晰可寻，郭文中亦谈及这一点。然而南、北是相对概念，王尔敏等都在论文中谈到南、北洋的划分是基于不同参照物。[③] 将视野聚焦至清代沿海各省，江苏、福建、浙江三省都存在各自的

［收稿日期］ 2024－07－14

［作者简介］ 何国璠（1994—　），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合肥 230039，heguofan@aliyun.com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4M750484）阶段性成果。

① 郭卫东：《释“北洋”》，《安徽史学》2012 年第 2 期。

② 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③ 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5 期上册，1986 年；陈佳荣：《宋元明清之东西南北洋》，《海交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李孝聪：《中国历史上的海上空间与沿海地图》，李孝聪主编：《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 年，第 287－303 页；黄纯艳：《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学术月刊》2020 年第 3 期；丁一：《耶鲁藏清代航海图北洋部分考释及其航线研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 25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31－455 页。

南、北洋，[①] 当参照系为整个中国海疆，南、北洋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本文主要讨论的便是后者。

一、漕粮海运与“南、北洋”概念的传播

学界在论述清代沙船业兴衰时，常转引《刘河镇记略》中记载的一段史料：“行驶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曰沙船，熟于奉、东洋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②] 结合语境，这段话似源自康熙朝“江海关章程”，长江口即“南、北洋”分界处，而南洋南端与北洋北端尚无确切边界。乾隆朝《江海关税则》中亦提到“南、北洋”，依然无确切界限。嘉庆《松江府志》中记载：“北洋海舶由蛇山收汇头；南洋海舶皆由塌饼门北径小羊山，又北径小七山收汇头。”[③] 可见长江口处南汇为南、北洋海舶集散之地，这与江海关税则中提到的南、北洋直接呼应。以上史料表明，清代前中期江南沿海，大致形成以长江口为界划分南、北洋的认知体系。

嘉庆朝曾议行海运，包世臣就说：“予曾游上海、崇明，登小洋、马迹诸山，从父老问南北洋事，稔海运大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④] 这段史料对中国沿海南北洋界域作了明确说明，是以吴淞口为界划分中国沿海。道光六年（1826），江南漕粮首次以海运方式转运京师，源自长江口地区舟师航行实践的“南、北洋”概念迅速在清朝野传播。道光帝本人就说：“朕思江苏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⑤] 这里的北洋囊括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沿海。齐彦槐《海运南漕议》云：“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⑥] 这与包世臣之言如出一辙。户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亦将吴淞口作为南、北洋分界线。[⑦] 魏源亦取齐彦槐之说。[⑧] 可以说，经过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以长江口为界划分南、北洋在江南士绅群体及中枢迅速形成共识，并且体现在海运事毕不久后纂成的《江苏海运全案》《皇朝经世文编》中。又由于亲历此次海运的穆彰阿、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在道咸年间崇高的声望，他们对南、北洋这组概念的认知无疑影响了后来的江浙官绅。道光二十二年，耆英等人奏陈道光帝：“臣等以洋面有南北之分，以大江为界，江以南为南洋，

---

① 《钦定户部则例》卷73《税则·江海关》,《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宫中朱批奏折》，浙江黄岩镇总兵刘文敏，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4-01-01-0438-024;《清仁宗实录》卷177，嘉庆十二年四月癸酉。

② 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3,《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2年，第344页。

③ 嘉庆《松江府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图经”第50b页。

④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第11页。

⑤ 道光五年二月初五日上谕，见贺长龄等纂辑:《江苏海运全案》卷1《谕旨·章奏》，马鸿雁等主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172页。

⑥ 齐彦槐:《海运南漕议》，贺长龄辑、魏源编次:《皇朝经世文编》卷48，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02页。（本处标点遵从点校本）齐彦槐称：“予拟海运章程三十六条，呈之陶云汀中丞、贺藕耕方伯，皆以为斟酌妥善，无可更改。”齐彦槐:《梅麓诗钞·谈海集》，光绪二年（1876）重刻本，第19b页。

⑦ 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8，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第609页。该奏疏亦见贺长龄等纂辑:《江苏海运全案》卷1《谕旨·章奏》，道光五年（1825）四月初十日具奏,《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4册，第187–188页。同日道光帝上谕:“英和折著发交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4册，第187–188、200页）齐彦槐在《谈海集》中称其曾上海运议一篇，经汪廷珍之手转交英和，得以上达。（齐彦槐:《梅麓诗钞·谈海集》，第1a页。

⑧ 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皇朝经世文编》卷48，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第628页。齐彦槐:《禀复魏元煜制军稿》，齐学裘撰，林日波整理:《见闻续笔》，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41页。

水深而多暗礁，利用广东之米艇，福建之同安梭；江以北为北洋，水浅而多暗沙，利用江南之沙船。”[①] 同年，耆英等人又奏：“至海洋亦以大江为限，江以南至广东皆为南洋，多暗礁。江以北至盛京皆为北洋，多暗沙。”[②] 可见，以吴淞口或者说长江口为界，将中国沿海划分为南、北洋已经在道光一朝成为共识。

从海底地形、水深、基岩海岸与泥质海岸的差异等自然条件看，以长江口为界划分中国南、北洋的确有实在依据，但并不足以成为远离江苏省沿海的其他省份的海船、沿海官员的参考依据，乃至于成为他们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在于清代官方组织的跨省航海活动，道光朝海运无疑使得南、北洋的确切边界得以成文。咸丰朝之后，江浙地区漕粮海运常态化，上海作为漕粮起运之地，对于既参与办理通商事务、又负责漕粮征集起运的两江督抚而言，南、北洋应该是极为熟悉的一组概念了。

二、“南、北洋大臣”命名由来

虽然光绪《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中都交代了有关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设立、职掌等基本情况，[③] 但吴福环也已指出，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著作中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约在同治元年（1862），官方文书中出现了“南洋通商大臣”的提法。[④] 通商大臣前冠以“南、北洋”要追溯到咸同之际。郭文中称“南、北洋之间，南洋官称在先”，“南为南洋大臣驻地，洋为举凡涉外洋务均由其管理。南洋大臣之设还引出了北洋大臣的设立”。笔者以为这两点并不十分恰当，确切地说，从具体管辖口岸的情况看，可以将南洋通商大臣的前身追溯为（总理）五口通商大臣。[⑤] 但在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议设三口通商大臣之前，[⑥] 不能称其为南洋通商大臣。

道光二十二年，耆英、伊里布先后被颁给钦差关防，伊里布于次年病逝后，耆英重任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各国通商事务。[⑦] 尔后此钦差大臣关防长期作为总理五口通商大臣关防。[⑧] 道光朝后期综理五口通商之钦差大臣常驻广州，直到咸丰八年清廷谕令由两江总督何桂清充任。[⑨] 相对于道光朝确定的五口通商，咸丰八年至十年间陆续开放了多个口岸。[⑩] 原先“五口通商”与

---

① 耆英、程矞采、尤渤：《耆英等奏请造同安梭船并变通水师营章程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 年第 2523 页。

② 耆英、李湘棻：《耆英等又奏会同李湘棻查明江北情形先行具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545 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22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④ 吴福环：《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河北学刊》1991 年第 1 期；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大陆杂志》第 20 卷第 5 期，1970 年。

⑤ 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耆英的头衔是“大清国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两广总督部堂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务”。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中法《黄埔条约》（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第四款亦称“总理五口大臣”。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2、54 页。

⑥《奕䜣桂良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674−2677 页。

⑦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703、2381、2605 页。

⑧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40 页。

⑨ 道光朝后期由两广总督担任钦差大臣，一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新授两广总督黄宗汉仍为钦差大臣。参见《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第 438 页；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245 页。

⑩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80、85、89−90、96、133 页。

“五口通商大臣”的说法显然不合时宜，在后续的官方往来文件中，一般将之统称为“通商各口”。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奕䜣等人正式提议在南北口岸分设通商大臣，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事务由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其余各口由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办理。①一直到此时，通商大臣前仍未加“南洋”或“北洋”字样。同治元年五月，薛焕在《奏为敬陈通商事务大臣不必专设事》中说：“伏查南洋及内江通商各口，惟闽、粤两关隶于将军及专差监督，其余除未报开埠诸口外，所有业经通市之处，多由各省督抚委令道员管关。”②“南洋”与“内江”并行，可知此处南洋为海疆地理名称。同时，薛焕又奏：“臣因通商事务，责成各省督抚将军较有实际，拟请裁撤通商大臣，以免虚縻经费。如因北洋三口现有大臣，南省亦应一律设立，似宜仍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③可知薛焕在思考有关“通商大臣”设立一事时，“南洋”与“北洋”同时出现。薛焕奏折上呈后，当月十七日上谕中就指出：“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间经耆英等议定设立，以为交涉事件在外商办之计。”④次月，曾国藩回奏：“今薛焕请裁南洋通商大臣归并地方，亦犹道光十年陶澍请裁两淮盐政归并总督也。以南洋之广，设一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薛焕所称鞭长莫及，诚属实在情形……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讨论职掌，永定章程。”⑤在曾国藩的语境中，南洋、北洋亦指疆域，而非指代洋务。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通商大臣这组概念的雏形——南洋各口地区的通商大臣与北洋三口地区的通商大臣——与薛焕的奏陈直接相关。检索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现有档案史料，同治元年薛焕上奏之时，南洋通商大臣仅是表达南洋口岸的通商大臣，并非固定专称，那么薛焕的奏折中南洋这一概念缘起何处?

薛焕于咸丰六年七月调苏州府知府，次年擢苏松粮储道，调苏松太道；咸丰八年授江苏按察使；咸丰十年转江宁布政使，晋巡抚衔，改江苏布政使，办理五口通商事务。“文宗皇帝知公可大任，又以公熟悉洋务，自调苏松太道后，皆以留办洋务，谕不得轻离上海。”⑥据此可知，薛焕在同治元年之前已久官上海，所任官职与漕粮海运直接相关。又据《重订江苏海运全案》，薛焕先后参与了咸丰六年冬漕、咸丰七年冬漕、咸丰十年冬漕。⑦薛焕任江苏巡抚时，其重要属吏之一吴煦任苏松太道。咸丰十一年，此时牛庄、天津、烟台三口已开，周家勋⑧与吴煦的往来信函中曾提及：“承示南洋各口税务，经赫税司一面之词，棘手情形了如指掌……北洋三口局面，远不如江、粤等关。”“北洋三口开办情形并应用经费各节，此间二月内曾经奏明试办在案……惟思南北通商各口，事同一律。”⑨可见在薛焕上奏之前，北洋三口、南洋各口的说法已经是幕僚间的惯常用语。

---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676-2677页。

② 《宫中朱批奏折》，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薛焕，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档案号：04-01-12-0494-078。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48页。

④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49页。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02-303页。

⑥ 钱保塘：《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工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公行状》，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13，《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1988年，第2111页。

⑦ 王毓藻辑：《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4，《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16册，第14、34、193页。

⑧ 周家勋，浙江钱塘举人，与吴煦同乡，同治元年因办理通商出力，升候补知府，因此，咸丰十一年间，周家勋可能在崇厚幕府办理通商事宜。曾国藩：《卸任天津道周家勋告病开缺折》(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第12册，第95页。

⑨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0、493-494页。

咸同年间江浙漕粮海运基本是以道光六年的海运作为成案，[1] 薛焕不可能没有看到过魏源、贺长龄纂辑的《江苏海运全案》，纵使薛焕没有与上海地区的沙船主交流，而《江苏海运全案》中所载关于南、北洋的划分也必然为薛焕等人所熟知。“吴公煦榷沪关兼苏藩，杨公坊以粮道综夷务。”[2] 在薛焕等人的交流语境中，办理各国通商事务与漕粮海运语境下的“南、北洋”是一脉相承的。总理衙门最终将上海及长江口岸通商事务均交由南洋通商大臣专管，而粤、闽、浙三省通商事务依然由南洋通商大臣兼管。

三、海防语境下的南、北洋界区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与刺马案接连发生，同年闰十月二十六日上谕：“直隶、江南为南、北洋总汇，以曾国藩、李鸿章分任其事。”[3] 自此南洋大臣、北洋大臣之名在官私文本中广泛出现。南洋大臣驻地在江南，北洋大臣驻地在直隶，所处理的事务还主要是对外通商，用薛焕的话说是“榷政”，此时的南、北洋已经带有高层辖区的特征。光绪朝，海防益重，这一特征更加显著。

（一）广义上的“南、北洋”界区

同光之际的海防大讨论中，丁日昌曾提出沿海防务划分为北、东、南三洋之说。[4] 但最终清廷选择以南、北洋二分海防辖区，且南、北洋防务分别交由时任南、北洋大臣的沈葆桢、李鸿章督办。[5] 至此，南洋地区的海防、通商事权集于两江总督，北洋地区集于直隶总督。正因为两江总督身兼南洋大臣之职，在海防层面上，长江口以北的江苏沿海被划入了“南洋”，奉天、直隶、山东三省沿海属北洋，江、浙、闽、粤四省沿海属南洋。光绪十一年（1885），曾国荃上奏：“海防区分南、北洋，而山东之烟台，归北洋兼辖，闽、浙、粤三口，归南洋兼辖。”[6] 这一点异于海运、通商背景下的“南、北洋”界域。也正是在光绪朝，海防志书中明确标定了南、北洋的界域。

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设立，帮办海军大臣善庆委派卫杰查勘沿海情形。“越岁余，《海口图说》完稿。”该书开篇即称：“天下海道分南、北洋，滨海者八省。”目录中注明关东、直津、山东沿海为北洋，江苏、浙江、广东、闽峤、台澎沿海为南洋。[7] 光绪十五年，帮办海军大臣、山东巡抚张曜委派萨承钰绘南北两洋各海口炮台图，次年《南北洋炮台图说》成书，书中南、北洋范围即八省沿海。黄国瑾在《上会典馆总裁总纂书》中说：“又咸丰、同治以来建立海防分南、北洋，北洋海防图因北洋大臣现住天津，已收入《畿辅通志》中，可调取据以入图；南洋各口，宜行文南洋大臣、闽、浙、两广画来，据以入图。”[8] 光绪《畿辅通志·海总图》与光绪

---

① “道光六年试行海运，近时奉为权舆，著有成效。”光绪《松江府续志》，光绪十年刻本，《凡例》第3a页。

② 陈锦：《勤余文牍》卷4《松沪从戎纪略》，光绪五年刻本，第11a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同治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9页。

④ 《广东巡抚张兆栋奏呈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一日，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⑥ 曾国荃：《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郑振铎编选：《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又据曾国荃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扩充机器局疏》中相关内容可知，《统筹闽粤浙三省防务片》时间为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参见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2册，第294页。

⑦ 卫杰：《海口图说》，国家图书馆藏，馆藏号：130675，《序》《目录》《中国海口形势总论》。

⑧ 萨承钰：《南北洋炮台图说》，萨承钰诸孙影印一砚斋藏本，2008年，第17–18页。黄国瑾撰，王晓卫点校：《训真书屋诗文存》，顾久主编：《黔南丛书》第16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9–330页。

《蓬莱县续志·奉直东三省北洋海疆图》均把北洋海疆作为描绘对象。① 光绪十七年，浙东名士陈虬亦称："近制以烟台南北分为二洋，北洋辖于直隶总督，南洋辖于两江总督。" ② 这里取烟台为界是从通商口岸的角度出发，因烟台为北洋三口最南端的一处口岸。光绪十九年前后，充任海军衙门帮总办上行走的傅云龙在《北洋海防津要表》中说："北洋之岚山与南洋孙家岛对峙如门。"③ 表明山东沿海属北洋，江苏沿海属南洋。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傅云龙在日记中亦记载了"南、北洋"的界限："所谓北洋者，天津东南至佘山二千五百里有奇，东至朝鲜千六百余里（南洋起佘山至广东）。"④ 此时傅云龙尚未入值海署（1893—1895年在署），依然认为长江口为南北洋分界，促成傅云龙前后认知转变的原因当与他在海军衙门的供职经历有关。如果将李鸿章海署会办大臣的身份纳入考量，可以观察到，以海军衙门为代表的清廷高层主导了新一轮南、北洋地理志书的书写与传播。

正因为清代舆图中标定南、北洋广泛出现在光绪朝，"1864 年湖北官书局刻印《南北洋合图》与《南洋分图》"的说法值得重新考量。图面本身并未注明出版年，此说法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⑤ 后来为学界广泛引用。然而湖北官书局设于同治六年（1867），且《湖北崇文书局自同治六年至十一年止汇刻各种书目》与光绪三年（1877）《湖北官书处书目》中均无该图。⑥ 民国时期（约 1923 年前后）的《湖北官书处新编书目》图志类中方有《南北洋联界图》。⑦ 且《南北洋合图》中已标注光绪元年所置台北府，《南洋分图》中已标注光绪元年所置恒春县、宜兰县，图面尚未反映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置情况。⑧ 结合时人刘可毅对该图的考辨，⑨《南北洋合图》的刻印当在光绪十年前后。事实上，《南洋分图》也是目前仅有的一幅以"南洋"作为主要描绘对象的清代舆图，而已知的北洋海疆图则有多幅。⑩ 这表明"南洋"作为独立地理单元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

---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 92《海防略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63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38-539 页。总纂黄彭年称："海图旁及山东、奉天，皆北洋也。"黄彭年：《〈畿辅通志〉凡例》，黄益整理：《陶楼诗文辑校》，齐鲁书社，2015 年，第 392 页。光绪《蓬莱县续志》，光绪八年刻本，《图说》，第 1 页。

② 陈虬：《经世博议·筹海》，薛玉琴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40 页。

③ 傅云龙：《籑喜庐文初集》卷 10《北洋海防津要表》，傅训成点校：《傅云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442 页；邓林、陈先松：《新发现缙绅录藏本与海军衙门章京再研究》，《清史研究》2025 年第 3 期。

④ 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69-70 页。

⑤ 王庸、茅乃文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 年，第 127-128 页。

⑥《湖北崇文书局自同治六年至十一年止汇刻各种书目》，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3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735-736 页；《湖北官书处书目》，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3 册，第 671 页。

⑦《湖北官书处新编书目》，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3 册，第 689-691 页；李明杰：《近代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刻书论略——从版本目录信息分析的视角》，《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⑧ 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06-313 页。

⑨ 刘可毅认为图上越南部分采择自申报馆所刊图，而光绪九年申报馆始有越南图。（刘可毅：《刘葆真太史遗稿》卷上《答从弟葆良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8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89-491 页）笔者以为《南北洋合图》中对越南部分的细致描绘也呼应了同时期国内关于越南舆地志书的大量出现，其重要背景就是光绪朝的中法战争。

⑩ 如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朱墨二色的"北洋图"与"南北洋总图"，注有经纬度，前者覆盖渤海周边，后者包括整个中国沿海。（郑诚：《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此外，卫杰《海口图说》之"总图"即《南北洋合图》之变体，文字注记相同，形状有错位。山东省图书馆藏《北洋沿海各海口总分图》（善本书号：4907），共 7 幅，第一幅《渤海图》；第二幅《奉天·大连湾进口》；第三幅无图名，范围大致由养马岛至芝罘岛；第四幅《奉天·旅顺口海疆炮台全图》；第五幅无图名，绘制威海、刘公岛一带；第六幅无图名，描绘海河入海口处；第七幅无图名，描绘胶州湾。

（二）狭义上的“南洋”界区

同治九年十月，清政府正式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营，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① 自此，李鸿章执北洋权柄近三十年，相较而言，江督的频繁易主无疑降低了南洋大臣的影响力。②

南洋大臣一职何时定归两江总督专责？郭文引《国朝柔远记》“同治四年（1865）”之说。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则记载：“（同治）七年奏准，南洋通商大臣，归两江总督经理。”④ “同治七年”之说源于当年七月曾国藩由江督调任直督，经奕䜣等人奏议后，新任江督马新贻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⑤ 同治九年，马新贻遇刺，奕䜣等人又奏：“所有上海通商大臣关防，应否照案仍令调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受，并令丁日昌会同办理，抑或于两员中专派一员之处，恭候钦定。”⑥ 可见同治九年时，由江督兼理南洋大臣，仅是成案，尚非定制。

前已述及，同治元年薛焕奏陈南洋地广，通商事务难由一人统筹专管，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对于粤、闽、浙三省通商事务仅为兼理。⑦ 光绪元年，清廷将沈葆桢擢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命其统筹南洋海防。由于独特的仕宦经历，沈葆桢坐镇江宁后仍能对福建船政施加影响。⑧ 然而南洋地面辽阔，光绪五年，清廷曾谕令福建巡抚丁日昌驰赴江南，会办南洋防务，“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⑨ 后因丁日昌请辞，清廷又谕令沈葆桢传知李成谋，命其赴福建厦门、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归南洋大臣节制。⑩ 故可知沈葆桢任南洋大臣时期，南洋水师或者说南洋防务的范围要大于江南沿海。然而光绪五年沈葆桢病逝后，涉及具体的海防部署，“南洋”这一概念往往被限定在南洋大臣驻地所在省份，通过沿海督抚的奏疏可管窥这一点。

光绪十年，刘铭传在奏疏中称：“朝廷既廑念海防为急务，似宜另设海部衙门，专力讲求水师，于南、北洋以及广东各设水师学堂一处，延访教习，先教管驾之才，次练水手。”⑪ 同年，他还称：“臣已密电南、北洋、闽省，倘资饷械，勿用民船，免资强敌。”⑫ 这两段话中南、北洋与广东、闽省并行，指代的当是狭义的南洋，即南洋大臣驻地所在的江南。傅云龙在《轮船表》中划分轮船归属时，南洋水师所辖亦仅限于江苏沿海。⑬ 可见此时讨论水师的语境中，南洋大臣对于两江以外的事务并无权限。但另一方面，南洋仍可指代广东至江苏沿海，如甲午战争前夕，

---

①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163 页。

② “直隶督臣李鸿章在任二十余年之久，不惜重费，一手经营，始克有此雄师，以之左提右挈。南洋官经数任，政出多门。”刘坤一：《筹办南洋防务考核兵轮及变通学堂折》，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陈代湘等校点：《刘坤一奏疏》，岳麓书社，2013 年，第 752 页。

③ 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11 页。

④ 光绪《大清会典》卷 10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22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⑤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447 页。

⑥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074 页。

⑦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341 页。

⑧ 陈悦：《从船政到南北洋：沈葆桢李鸿章通信与近代海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62–163 页。

⑨《清德宗实录》卷 92，光绪五年闰三月乙未。

⑩《清德宗实录》卷 95，光绪五年五月庚寅。此时长江水师各营仍由彭玉麟巡阅。

⑪ 刘铭传：《呈整顿海防讲求武备各事宜清单》，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杜宏春辑笺：《刘铭传文献汇笺》，黄山书社，2020 年，第 86 页。

⑫ 刘铭传：《请令闽督筹饷并法人封口劫杀商船片》，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杜宏春辑笺：《刘铭传文献汇笺》，第 133 页。

⑬ 傅云龙：《籑喜庐文初集》卷 10《轮船表》，傅训成点校：《傅云龙集》，第 432–438 页。

粤督李瀚章在电报中仍称“广东为南洋第一重门户”。[①]

四、结语

以长江口为界将整个中国沿海划分为南、北洋，这一区域性认知在清政府上下的普及始于道光朝漕粮海运；咸同之际，两江督抚及其僚属们在办理通商与海运事务时亦曾沿续此认知。沿海、沿江众多口岸的陆续开放促使原先的总理五口通商大臣转型为南洋通商大臣，也促成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的设立，南洋大臣的辖区一度扩大。光绪元年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广义上的南洋囊括了长江口以北的江苏沿海，狭义上的南洋则仅限于两江。

从作战指挥角度而言，光绪朝清廷筹办南、北洋海防，筹建南、北洋水师无疑比先前七省水师各自为战更进一步，尔后海防股、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设立，都是清政府为统筹海防作出的努力。[②] 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海军衙门随之裁撤，南、北洋这组概念虽仍然延续，但主要内缩至陆疆部分，如宣统年间陈三立所言：“国家自海通以来，南、北洋屹然为国内重镇，南洋辖三巡抚、四布政使，地尤广。士大夫欲发名成业以才智自效于时者，争趋江宁。江宁者，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所驻地也。”[③] 取而代之的海域划分方式则是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分中国沿海。宏观来看，清政府对中国沿海疆域的称呼或者说划分方式，在晚清经历了从“七省（八省）”到“南、北洋”的转变；而清末民初以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划分中国海域逐渐成为认知主流，“东南皆有中国海，沿海各省不得为边地也”。[④] 更为明确的“海域”概念从原有的“海疆”概念中分离出来。

References

Chen Jiarong. "*Song yuan ming qing zhi dong xi nan beiyang*" (The concept of the eastern ocean, western ocean, southern ocean, northern ocean during the Song through Qing dynasties). *Haijiaoshi yanjiu*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1 (1992).

Guo Weidong. "*Shi beiyang*" (Comments on the northern ocean). *Anhui shixu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2 (2012).

Guo Weidong. "*Xinshijieguan de xingcheng: dong xi nan beiyang de gainian liubia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worldview: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ocean, western ocean, southern ocean, northern ocean).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1 (2024).

Wang Ermin. "*Jindaishi shang de dong xi nan bei yang*" (The concept of the eastern ocean, western ocean, southern ocean, northern ocean in early modern China).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5 (1986).

Wu Fuhuan. "*Nanbeiyang dachen de sheli ji qi yu zongliyamen de guanx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

① 李瀚章：《为广东严密布置海防等事》，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9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9 页。

② 徐笑运：《清季海防股与海军衙门关系考辨》，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 16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50–261 页。

③ 陈三立：《候补四品京堂蒯公神道碑》，蒯光典：《金粟斋遗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8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60 页。

④ 刘铎：《地图分编简明目录》卷首序，光绪三十二年外务部排印本。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for the southern ocean and northern oce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 office). *Hebei xuekan* (Hebei Academic Journal) 1 (1991).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outhern Ocean and Northern Ocean in Late Qing China

HE Guof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guofan@aliyun.com)

Abstract: Maritime territories were divided in various way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by sea during the Daoguang reign. The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all agreed that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w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Northern Ocean" and "Southern Ocean". During the Tongzhi reign, the emergence of the title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for the Southern Ocean" was linked to the gradual opening of multiple treaty ports, with the former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for the Five Ports" transitioning into this new role. In 1875, Shen Baozhen and Li Hongzhang were respectively tasked with overseeing coastal defense for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Oceans. Within this maritime defense framework, the "Southern Ocean" was redefined to encompass the entire Jiangsu coastline, including areas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Imperial Navy Ministry organized a compilation series of geographical maps and books regard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Oceans. A lot of cartographic works focusing on the Northern Ocean were produced. Due to the Southern Ocean's vast expanse and frequent turnover of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the authority of the Southern Ocean Superintendent—and even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of the "Southern Ocean" itself—mainly contract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Liangjiang during the mid-to-late Guangxu reign.

Keywords: sea transportation, China's coast, Southern Ocean, Northern Ocean